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



采访中的弗里德曼



在旧金山弗里德曼家中



拜会弗里德曼



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



阿罗在采访中



来自旧金山大学的毕克茜教授协助采访阿罗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



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



路边的指示牌“布坎南的家”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

华盛顿郊区的布坎南之家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克维茨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



采访马克维茨





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在办公室中接受采访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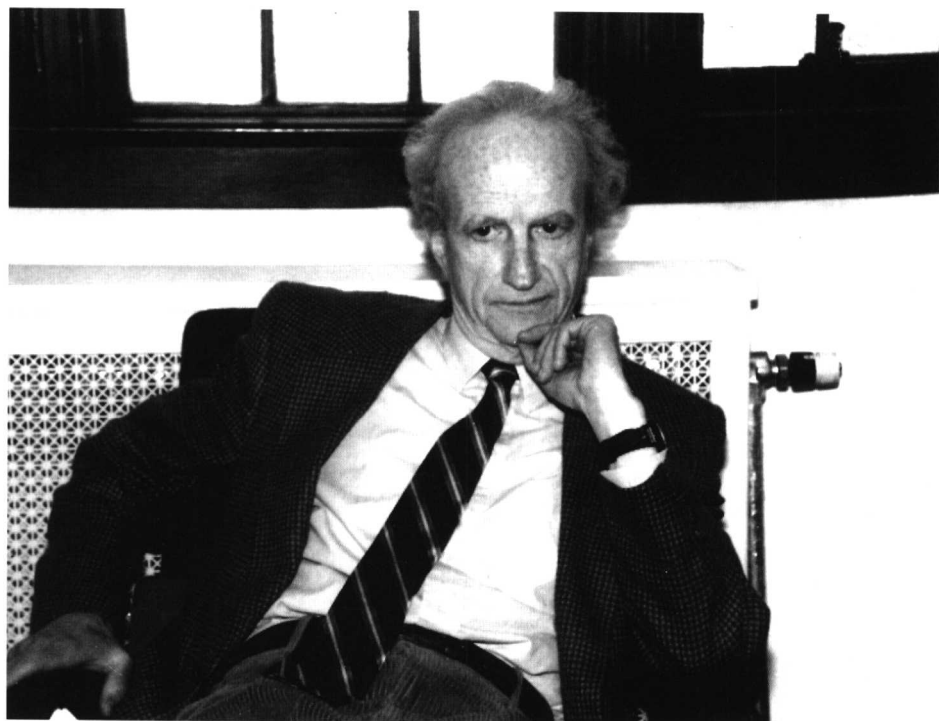
组图：采访克莱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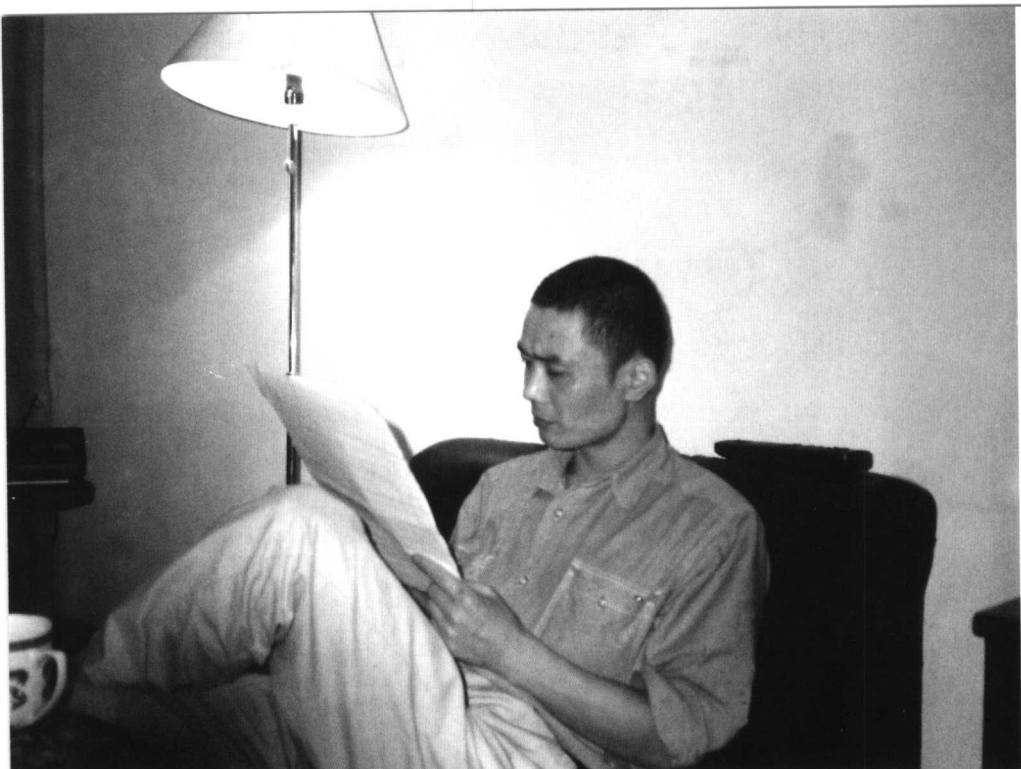
组图：采访克莱因之二



组图：采访克莱因之三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



赴美前，高小勇在成都为本次采访认真做准备



在斯坦福大学“顺便”采访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



高小勇与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



《经济学消息报》报社



向时任美国驻蓉领事馆的弗兰科先生
赠送“NOBEL大追寻留念”T恤



高小勇 汪丁丁

Gurus Interview:
Nobel Laureates on
Chinese Economy and Economics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

高小勇 汪丁丁 编



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

——2000年,江泽民同志接受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华莱士专访时,提到《经济学消息报》高小勇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事

《经济学消息报》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确立了在国内理论界和决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主要应归功于该报总编辑过人的眼光和超常的组织能力,他这种品质在本次采访中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

——选自林毅夫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追寻智者》

在这假冒伪劣泛滥、人人都想称自己是“世界之最”的日子里,《经济学消息报》的“诺贝尔大追寻”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首创:天下恐怕还没有哪一家报纸,集中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面地采访过这么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选自樊纲教授《基础理论与具体应用》

策划编辑 田 辉 王景伟 张宏宇
联智传播/慕云五
责任编辑 张宏宇 马海宽
装帧设计 联智传播/刘 科

ISBN 7-5054-1246-9



9 787505 412460 >

ISBN 7-5054-1246-9/G·0628 定价: 28.00 元



Gurus Interview:
Nobel Laureates on
高小勇 汪丁丁 Chinese Economy and Economics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

高小勇 汪丁丁 编

●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高小勇，汪丁丁编．—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5
ISBN 7-5054-1246-9

I.高... II.①高...②汪... III.经济—研究—中国 IV.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8490号

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

主 编 高小勇 汪丁丁

策划编辑 田 辉 王景伟 张宏宇
联智传播/慕云五

责任编辑 张宏宇 马海宽

助理编辑 袁 莉

责任印制 赵 岭

装帧设计 刘 科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字 数 325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5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246-9/G·062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再版序言

距那次采访已经有十一个年头了。

有新闻教科书解读分析这次采访——它已经被当成一次新闻实践的成功案例。但我还是觉得，外人是很难理解这次采访的。

在十多年前、管理比现在还森严许多的行业，一家无钱无势的报纸是如何做这件事的？说它无钱，是说当时它的财力对未来几周能否出版都没有把握；说它无势，是说它除了有些作者、书生，以及订户外，别无依靠，至今仍蒙当局“法外开恩”存活。事实上，全国没有一家如此安身立命十余年的报纸。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次学术性色彩浓厚、影响很大的采访（采访内容被国务院研究室以“送阅件”形式报送给了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并被国家总理指定列入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指示中国计划出版社将这次采访结集出版），它的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却是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这次采访就来源于他偶然的胡思乱想。我得坦率承认，当时美国12位诺奖得主讲了许多，讲得唾沫横飞，但我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在美国的15天，我像一个监工，满意于事情正常展开就行了——没有人昏倒和乘错了飞机。那时候，许多人读这本书，我却看不懂，真是黑色幽默。尽管，我现在更像这本书的真正读者了，而不像采访者和主编。我现在理解了他们说的一些东西，甚至不同意其中一

些人的看法。比如西蒙。他批评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主张著名的“有限理性”。但我觉得西蒙是没事找事。因为经济学假设的理性本身就是局限下的理性，是各种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如果讲的是没有局限的理性，那现在全世界大学学习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整个就是一套自我反驳。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若不是局限下的理性，那么人就是上帝，全知全能的，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它失败的原因就得重新寻找。当然，看似无聊的“有限理性”说不定正是它刺激了有关信息的价格研究和信息经济学的兴起。

如今，我对经济学是有了一些个人的“偏见”，但十一年前采访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我对经济学确实一窍不通，那样做只是为了好玩，并不是打算自己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去。

无钱、无势、无知识，进行了一次要钱、要批准、要知识的跨国采访，我都不知道如何成就的，那些分析解读此事的人一定是神仙。

为这本书再版作序，主要是为了了却一件让我一直负疚的事。我要感谢成全了这次采访的一个人和一个组织。如果没有1994年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海闻的费心组织和协调，没有留美经济学会毕克茜、丁专鑫、许小年、李玲、黄河等博士在美国各城市的接送和采访翻译，是不会有我这次快乐的历险的。留美经济学会感念这次采访辛苦，海闻当时还代表学会要赠钱给我，我很快乐就辞谢了，可能是不好意思接受。

顺便要提及的是，1994年的这次采访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让我问心有愧，我感觉名不副实，于是在多年以后又委托汪丁丁博士进行一次专业内行的采访，以回报社会。事情并不尽人意，但聊胜于无。所以，这本书新收录了汪丁丁博士尚存的三篇采访。

十一年后的今天，也是五月，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华举办“诺奖论坛”。中央电视台为直播这次盛会，邀我来京策划这次报道，我很想笑。

高小勇

2005年5月9日夜

于北京梅地亚

基础理论与具体应用

——“大追寻”后的反思

(代序)

在这假冒伪劣泛滥、人人都想称自己是“世界之最”的日子里，《经济学消息报》的“诺贝尔大追寻”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首创”：天下恐怕还没有哪一家报张，集中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面地采访过这么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不是新闻媒体的哗众取宠，而是表现出我们90年代的中国人对经济学科学真理的“大追求”！

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特点是：它不是授予成功地应用经济理论并制定出某种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某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经济学家”，而是授给在经济科学基础理论或方法上做出重要贡献，并因此而促进了经济学在各领域内成功应用的“理论经济学家”。这次采访的12名经济学家都属于这一族（萨缪尔森曾拒绝了在总统顾问委员会任职的邀请）。当然，在这12位之外，其他诺贝尔奖得主有的曾出任政府顾问，如托宾，但他获奖的原因还是由于他在基础理论上的贡献。

像任何其他可以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的差别。也像其他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一样，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比如经济学中关于“行

为理性”的理论,关于人的消费偏好与物质资源配置之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关于物质“生产函数”的理论,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关系的理论,关于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关系的理论,关于各利益集团相互冲突与公共选择的理论,关于制度形成与演化的理论,等等,在这些理论当中,都有许多内容,属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范畴。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因它们是由一些外国人、由一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人所发明和发展,就与我们无关,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基础理论,就无须认真地加以学习和掌握。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追寻,最主要的就是追寻他们各自为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经济科学基础理论所做的特殊贡献。

有条件、有“国界”、有利益差别的,是经济学理论的“应用”。首先,就经济学的一般内容而言,可以应用于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在不同阶段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在经济分析中就相当于不同的“限制条件”,在这些不同的限制条件下所得出的针对具体情况的“对策结论”,自然也就是不同的。其次,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比如不同的“平等”观,不同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念),也会导致经济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不同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因为不同的价值观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具有不同的偏好目标,人们想要“最大化”的那个一般性目标函数即所谓的“幸福”(效用函数),具有不同的内容,决定着人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再者,社会是分成利益集团的(有的情况可称为“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他们都可以利用经济学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学与其他一些科学也没有什么差别,比如人们既可以利用物理学原理造核电站服务于人类,也可以用同一些基础理论来造原子弹杀害人类。当然,这不否定经济学家本身(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超脱利益的纷争,更多地追求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更好地执行“利益纠纷仲裁人”的职能(布坎南语),但即便如此,经济学家自己要先明确,社会各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的冲突,经济制度改进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冲突各方的利益更好地加以协调,防止因一方利益受到过多损害而导致激

励不足或社会动荡，使经济效率得以改进，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

真正的“大家”，不会忽视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具体问题时所面临的限制条件。从这次“大追寻”的各篇访谈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在谈出自己观点的同时，都强调了具体条件的重要性，许多人都谦虚而客观地提到自己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所提意见不一定中肯。与此同时，作为追求真理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们也强调了一般性基本原理的普遍意义，从他们各自所擅长的领域出发，阐发与强调了某一方面的经济规律。我想“大追寻”各篇谈话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其实不在于各诺贝尔奖得主们提出的那些具体的“对策性”观点，而在于他们所阐发的那些基本原理与一般规律，在于他们将这些基础理论与具体条件相联系时所采用的那种思维方法。

这也让人联想到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和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政策分析（比如那些因政策观点分歧而形成的各“流派”的种种政策主张）。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颠倒了”的论点。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二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我们最有用、最应该认真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容与方法；而那些具体应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某些国家、某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某种特定文化背景而得出的某些具体的结论、具体的政策、具体的做法，才是真正不必给予过多强调的。如果我们掌握了基本理论与方法，我们对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各种具体条件肯定比“外人”（包括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们）更熟悉得多，就可以自己来“应用”，得出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最优的”具体结论，包括最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具体制度安排、具体政策手段、具体发展战略。而如果我们只去学那些“皮毛”的东西而没有学基础理论，那一定会经常发生这些年人们总在指责的“照搬西方”或“下错药”的问题，而且只能老去请别人来“当顾问”，自己总也拿不出高明的办法（当然这不否认今后我们还是不断请人家来当顾问）。

“大追寻”不是“追星族”的“发烧”，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科学，使我们能在经济学这一重要、甚至是最重要（自吹？）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也逐步“与国际接轨”，更好地服务于我们自己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伟大事